



《哲学与文化》丛书 | 江怡 主编

《诸儒鸣道集》研究

——兼对前朱子时代道学发展的考察

田智忠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《哲学与文化》丛书 ■ 江怡 主编

《诸儒鸣道集》研究

——兼对前朱子时代道学发展的考察

田智忠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诸儒鸣道集》研究：兼对前朱子时代道学发展的考察 /
田智忠著. —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2. 11
ISBN 978-7-5161-1389-9

I. ①诸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理学—研究—中国—宋代
②《诸儒鸣道集》—研究 IV. ①B244. 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16554 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储诚喜
责任校对 王兰馨
责任印制 王炳图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邮编 100720)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中文域名：中国社科网 010-64070619
发 行 部 010-84083685
门 市 部 010-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21.75
插 页 2
字 数 368 千字
定 价 65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，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电话：010-64009791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上编 关于《诸儒鸣道集》的基础性研究

导言	(3)
一 《诸儒鸣道集》简介	(3)
二 《诸儒鸣道集》的研究现状	(23)
第一章 《诸儒鸣道集》原刻年代考	(34)
一 从避讳角度看《诸儒鸣道集》的原刻时间	(35)
二 从刻工角度看《诸儒鸣道集》的原刻时间	(37)
三 从版本学角度看《诸儒鸣道集》原刻时间的上限	(40)
四 从反证角度看《诸儒鸣道集》原刻时间的下限	(45)
五 一点疑问	(46)
余论	(48)
第二章 “鸣道本”《二程语录》与《程氏遗书》比较研究	(59)
一 对《语录》与《遗书》之条目排列顺序的比对	(59)
二 对《语录》与《遗书》的详细比对与校勘	(93)
三 《语录》与《遗书》渊源关系新考	(191)
四 关于《语录》面世原因的推测	(199)
结论	(200)
第三章 关于《诸儒鸣道集》编者身份的初步推测	(201)
一 关于《诸儒鸣道集》选书标准的“去取不可晓”	(203)
二 对《诸儒鸣道集》选编质量的审查	(204)
三 必须考虑盗版的因素	(208)
四 图书编刻者所要具备的客观条件	(209)
五 从该书影响的角度看	(211)
六 与朱子可能的关系	(213)

总结	(216)
附录	(217)
第四章 《太极图》与《太极图说》之关系再考察	(220)
一 关于《图》与《说》之分与合的说明	(220)
二 从一则材料看“九江本”《通书》是否包含《说》	(221)
三 对“潘志”所记载周敦颐著作的新解读	(225)
四 结合《语录》《濂溪通书》看《图》与《说》早期的 分合情况	(228)
 下编 关于《诸儒鸣道集》的思想性研究 	
第五章 《诸儒鸣道集》视野下的宋代儒学多元性研究	(239)
一 河汾道统	(240)
二 朔学代表	(245)
三 江公望的《心性说》	(248)
四 刘子翥的《圣传论》	(253)
结论	(257)
第六章 周敦颐与张载的道学话语构建	(258)
一 周敦颐对道学话语模式的构建	(258)
二 张载对道学话语模式的构建	(264)
第七章 二程对道学话语的构建	(276)
一 天理观	(277)
二 性即理	(280)
三 仁说	(283)
四 工夫论	(288)
结语	(291)
第八章 谢良佐与杨时对道学话语的构建	(292)
一 谢良佐的高远之学	(292)
二 杨时之学趋于简易	(306)
结语	(323)
附录	(325)
刘子翥的《崇安圣传论》与《圣传论十首》详细校勘记录	(325)

参考文献	(334)
后记	(336)

上 编
关于《诸儒鸣道集》的
基础性研究

导 言

一 《诸儒鸣道集》简介

《诸儒鸣道集》是唯一由宋人所编纂的一部传世理学丛书,^① 而且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我国第一部丛书,^② 该书中所收录的许多著作,也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,其版本与学术价值显而易见。

我们目前所见到的《诸儒鸣道集》,系由黄壮猷在宋理宗端平二年(1235年)修补后印本,而非原刻本。关于此修补印本的基本状况,学界多有介绍:

如,在清人潘祖荫所著的《滂喜斋藏书记》一书中提到《诸儒鸣道集》:“所采诸儒语录,自濂溪、涑水以下凡十三家。《濂溪通书》一卷、《涑水迂书》一卷,横渠《正蒙》八卷、《经学理窟》五卷、《语录》三卷、《二程语录》二十七卷、《上蔡语录》三卷、《元城语录》三卷、《刘先生谭录》一卷、《道护录》一卷、《江民表心性说》一卷、《龟山语录》四卷、《安正忘筌集》十卷、《崇安圣传论》二卷、《横浦日新》二卷。后有楷书题记云:‘越有《诸儒鸣道集》最佳,年久板腐字漫,观者病之,乃命刊工剡蠹填梓,随订旧本,侵足其文,令整楷焉。时端平二禩八月吉日,郡守闽川黄壮猷书。’每半叶十二行,行廿一字,内缺《迂书》一卷、《理窟·第五》一卷、《二程语录》第八至十九卷,皆钞补明文渊阁官书,其书函犹原库装也,至今不蠹不脱,触手如新,昆山徐氏旧藏。”^③

顾廷龙先生也提到《诸儒鸣道集》:“此本框高十九点三公分,宽十

① 顾廷龙:《景印宋本〈诸儒鸣道〉弁言》,载《诸儒鸣道集》,济南:山东友谊出版社1992年版,第5页。

② 陈来:《略论〈诸儒鸣道集〉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86年第1期。

③ 潘祖荫:《滂喜斋藏书记》卷二,《子部》,“宋刻诸儒鸣道集七十二卷”条,上海:中国历代题跋丛书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,第48—49页。

四公分，半页十二行，行廿一字，左右双栏，白口，单鱼尾，字仿欧体，皮纸精印”^① 云云。

《诸儒鸣道集》一书，共收录宋儒周敦颐、张载、二程、司马光、杨时、谢良佐、刘安世、潘殖、刘子翬、江公望、张九成十一位学者的著作共十五种。对于该书所收录的各种著作，前贤多已经有过详细的说明，现择其要并结合本人的校读资料，有选择的说明如下：

周敦颐的《濂溪通书》一卷

“鸣道本”（指《诸儒鸣道集》所收录该书的版本，下同）《濂溪通书》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的《通书》，也要早于朱子所整理的“长沙本”《太极通书》。《濂溪通书》与世传本的《通书》（即朱熹所编订的“南康本”《太极通书》）在内容上也颇有不同。《濂溪通书》最引人注目之点在于，书中并没有收录《太极图》和《太极图说》。这颇能引起我们对《通书》早期流传问题的关注。

朱子在《太极通书后序》（即朱子所编订的“建安本”《太极通书》的后序）一文中曾指出：“右周子之书一编，今春陵、零陵、九江皆有本，而互有同异，长沙本最后出，乃熹所编定，视他本最详密矣，然犹有所未尽也……”^② 在这里，朱子所说的“未尽”，应该是说在“建安本”《太极通书》之前的《通书》诸版本，都是把《太极图》附于末尾，“此则诸本皆失之”这一点吧。对此，陈来师已经指出，朱子的上述说法“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符”：因为祁宽的《通书后跋》一文已经指明“九江本”《通书》无《太极图》这一事实（据本报告考证，“九江本”中确实收录有《太极说》，即《太极图说》），而“鸣道本”《濂溪通书》则进一步证实了祁宽的说法，并表明《通书》早期流传情况极为复杂，即有不收录《太极图》和《太极图说》的版本（如“鸣道本”），也有只收录《太极图说》却不收录《太极图》的版本（临汀杨方所见“九江本”），还有完整收录《太极图》和《太极图说》的程门传本。从上述情况看，《通书》早期版本的流传，有一个逐渐被充实、丰富的过程，这个过程是在朱子手中最后完成的。

① 《景印宋本〈诸儒鸣道〉弁言》，第5页。

② 周敦颐著，陈克明点校：《周敦颐集》，中华书局1990年版，第42页。

“鸣道本”《濂溪通书》与朱子所编的“南康本”《太极通书》^①（下文中简称为“南康本”）之间，在具体文字上也稍有不同，详列如下：

第一，《诚几德》章：“发微不见，充周不可穷之谓神”，“南康本”作：“发微不可见，充周不可穷之谓神”，^②“鸣道本”似有脱字。

第二，《师》章：“性者，刚柔、善恶，中而已……惟中者，和也……暗者求于明师道立矣”，“南康本”则作：“性者，刚柔、善恶，中而已矣……惟中也者，和也……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”，^③两相比较，“南康本”为优。

第三，《化》章：“故圣人在上，以仁育万民，以义正万民。天道行而万物顺，圣德修而万民化……噫，道岂远乎哉？”“南康本”题为《顺化》章，作：“故圣人在上，以仁育万物，以义正万民。天道行而万物顺，圣德修而万民化……道岂远乎哉？”^④从此句的排比句式判断，前一处“南康本”作“物”字为优，而后一处“鸣道本”有“噫”字为优。

第四，《礼乐》章：“阴阳理然后和”，“南康本”作：“阴阳理而后和”，^⑤二者可并存。

第五，《务实》章：“德业未有著”，“南康本”同，今理学丛书本《周敦颐集》则作“德业有未著”，^⑥为优。

第六，《爱敬》章：“孰无过，乌知其不能改”，“南康本”作：“孰无过焉？知其不能改”，^⑦据下文判断，“鸣道本”为优。

第七，《乐》章：“古圣王制礼法”，“南康本”题为《乐上》章，作：“古者圣王制礼法”，^⑧“南康本”为优。

第八，《圣学》章：“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”，“南康本”作：“圣可学

① 见于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八十八册之《元公周先生濂溪集》卷四。

② 《濂溪通书·诚几德》，载《诸儒鸣道集》卷一，第43页；《元公周先生濂溪集》卷四，载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八十八册，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92页。《元公周先生濂溪集》，下文中简称《濂溪集》。

③ 见《诸儒鸣道集》卷一，第44页；《濂溪集》，第94页。

④ 《诸儒鸣道集》卷一，第47页；《濂溪集》，第96页。

⑤ 同上书，第97页。

⑥ 《诸儒鸣道集》卷一，第48页；《濂溪集》，第97页；《周敦颐集》，第24页。

⑦ 《诸儒鸣道集》卷一，第48页；《濂溪集》，第97页。

⑧ 《诸儒鸣道集》卷一，第49页；《濂溪集》，第99页。

乎曰可曰有要乎”，^①“鸣道本”显有脱字。

第九，《颜子》章：“夫富贵，人所爱者也”，“南康本”作：“夫富贵，人所爱也”，^②“南康本”为优。

第十，《圣蕴》章：“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不复也。孔子曰：‘予欲无言……’”，“南康本”作：“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子曰：‘予欲无言……’”^③。

第十一，《乾损益动》章：“乾之用其善是损益之大莫非（一本无非字）是过”，“南康本”无双行夹注，也无“非”字^④。

第十二，《家人睽复无妄》章：“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……无妄则诚焉”，“南康本”作：“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……无妄则诚矣”，^⑤可两存。

第十三，《刑》章：“既成矣不止即过焉”，“南康本”作：“既成矣不止则过焉”，^⑥“南康本”为优。

第十四，《孔子》章：“王祀孔子报德报功无尽焉……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者”，“南康本”作：“王祀夫子报德报功之无尽焉……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”^⑦。

第十五，《蒙艮》章：“山下出泉静而止（双行夹注：一作而清也）”，“南康本”无双行夹注，作“山下出泉静而清”^⑧。

就二者的刊刻质量而论，“南康本”明显为优，这并不令人奇怪。不过，“南康本”却有两处明显不及《濂溪通书》。由此可知：其一，朱子在编订“南康本”时，并没有参考《濂溪通书》，否则他会据此来改正“南康本”中的错误。其二，与朱子所提到的“九江本”及“胡宏本”《通书》相比较，《濂溪通书》的错误更少。其三，《诸儒鸣道集》的编者不选在当时更为流行（也更容易得到）的程门传本的《通书》，却选择

① 《诸儒鸣道集》卷一，第50页；《濂溪集》，第100页。

② 《诸儒鸣道集》卷一，第51页；《濂溪集》，第101页。

③ 《诸儒鸣道集》卷一，第53页；《濂溪集》，第103页。

④ 《诸儒鸣道集》卷一，第54页；《濂溪集》，第104页。

⑤ 《诸儒鸣道集》卷一，第55页；《濂溪集》，第105页。

⑥ 《诸儒鸣道集》卷一，第56页；《濂溪集》，第106页。

⑦ 《诸儒鸣道集》卷一，第57页；《濂溪集》，第107页。

⑧ 同上。

《濂溪通书》，原因待考。但是，这或许说明，其与程门之间未必有直接师承渊源关系。

就二者刊刻的时间而论，“鸣道本”《濂溪通书》要早于“南康本”《太极通书》，乃至“长沙本”《通书》，这一点当无疑义。例如，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注意，即在《濂溪通书》中，有一处作“孔子曰”、另一处作“孔子”，而在“南康本”中，则分别变成了“子曰”和“夫子”，这些细微的差异其实是有深意的：后者之称谓更为“亲切”，也流露出对儒家道统更为强烈的认同感。我们基本可以判定，称“孔子曰”和“孔子”的《濂溪通书》更接近周敦颐的原稿，原因是假定周敦颐的原稿作“子曰”和“夫子”，其在后来是不大可能会被改作“孔子曰”和“孔子”的（此一点，系受王博老师讲授《论语》时的启发，特表感谢）。

不过，“鸣道本”《濂溪通书》的编订年代也不可能太早，因为该书中三次出现以双行夹注“一本”或“一作”形式出现的校勘痕迹（除上文中给出的例子外，另外一次出现在《濂溪通书》的《理性命》章中）。这足以说明，《濂溪通书》的编者（不一定是《诸儒鸣道集》的编者）在编订《濂溪通书》时，至少是参考了当时流行中的，两个以上版本的《通书》，因此《濂溪通书》本身不可能是《通书》最早的版本，其编订年代很可能要在南宋之后。至于《濂溪通书》中为什么不收录《太极图》和《太极图说》，原因存疑。当然，《濂溪通书》的编者很可能也认为《太极图》或《太极图说》本身就不属于《通书》，尤其是如果他们见到的《通书》版本是把《太极图》或《太极图说》附在文后的话。

司马光的《涑水迂书》一卷

“鸣道本”《涑水迂书》与世传的四部丛刊影宋本《迂书》（见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，卷七十四）的内容基本相同。此二书与四库全书本《迂书》（收入四库本《传家集》中）比较，则又有一定的差异。如，“四库本”《迂书序》有双行夹注“嘉祐二年作”云云，为“鸣道本”和四部丛刊本所无；“四库本”《知非》条下有双行夹注“嘉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作”，也为“鸣道本”和四部丛刊本所无；类似的情况还包括《天人·迂叟曰天力之所不及者》、《理性》、《事亲》、《事神》、《宽猛》、《无益》、《学要》、《治心》、《文害》、《道大》、《道同》、《绝四》、《求用》、《负恩》、《羨厌》、《老释》、《凿龙门辨》、《无为赞》诸条，“四库本”

都有双行夹注注明了其具体写作年代，这都是“鸣道本”和四部丛刊本所无。又如，此二书的《无为赞贻邢和叔》，“四库本”只作《无为赞》，可知“鸣道本”《涑水迁书》更接近司马光的原稿。

另外，“鸣道本”和四部丛刊本《涑水迁书》明显不同于“四库本”《迁书》之处，是缺少《天人·迁叟曰天力之所不及者》条。“鸣道本”《涑水迁书》本为清人配抄，是否有所遗漏，待考。

张载的《横渠正蒙书》八卷

“鸣道本”《横渠正蒙书》八卷是目前仅见的宋刻全本《正蒙》，也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《正蒙》刻本。林乐昌先生以为：“在《正蒙》的两个明本之前，再向前追溯，还有两个宋本，按时间先后看，一是南宋宁宗庆元三年（1197）《国朝二百家明贤文粹》书隐斋刻本所收《正蒙书》上下太极图二卷，简称文粹本；二是南宋理宗端平二年（1235）《诸儒鸣道》浙刻本所收《横渠正蒙书》八卷，简称鸣道本。由于早于鸣道本的文粹本只是节选本，故当以鸣道本为《正蒙》之祖本，而文粹本则仍有重要的对校价值。”^① 这里，林先生显然是把《诸儒鸣道集》的再刻时间当成了它的原刻时间，其说不确。

陈来师据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以及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等书指出，宋代流行的《正蒙》基本上为十卷本，而“鸣道本”《横渠正蒙书》则为八卷本，“鸣道本”所缺的是“胡安国所传编为一卷”和“末有行状一卷”，而非缺《正蒙》的正文。^② 但是，胡安国所传一卷的内容具体究竟是“传”（zhuan），还是“所传（chuan）者”，目前还不确定。

“鸣道本”《横渠正蒙书》与《张子全书》本《正蒙》比较，内容基本相同。今中华书局本《张载集》中的《正蒙》，点校者根据《横渠易说》、《周易系词精义》、《宋元学案》、《张子正蒙注》等书，指出《张子全书》本《正蒙》存在着大量的“错误”。但是，这些“错误”却又都出现在“鸣道本”《横渠正蒙书》中。由此可知，《正蒙》的初稿很可能已经包含有这些“错误”了。具体原因，应该是张载在撰写《正蒙》时，多是仅凭记忆随意来转述他早年的研究成果所致。

① 林乐昌：《通行本〈正蒙〉校勘辨误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2010年4期，第54—58页。

② 《略论〈诸儒鸣道集〉》，第32页。

“鸣道本”《横渠正蒙书》在具体内容上与“张载集本”《正蒙》也稍有不同。^①如《大易》篇“洁净精微，不累其迹”条，“鸣道本”后有双行夹注：“一本云‘深于易矣’”，此双行夹注为其他诸本所无。^②又如，《乐器》篇“亲亲尊尊又曰亲亲尊贤”条，“鸣道本”后有双行夹注：“一本先得作先将”，此双行夹注也为其他诸本所无。同篇“义民安分之良民而已”条，“鸣道本”后有双行夹注：“一本‘准牧’下有‘无’字，併为一节”，为其他诸本所无。^③再如，“鸣道本”的《乾称》篇中，则有数条错误：

其一，“凡可状皆有也”条，“鸣道本”作：“凡可状，皆有也；凡有，皆象也；凡象，皆气也。气之性本虚而神，则神与性乃气所因有，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。至诚，天性也；不息，天命也。人能至诚，则性尽而神可穷矣；不息，则命行而化可知矣。学未至知化，非真得也。舍气有象否？非象有意否？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，性也。不能为一，非尽性也。饮食男女，皆性也，是乌可灭？然则有无皆性也。是岂无对？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，果畅真理乎？”

此条在“四库本”被分为三条：

“凡可状，皆有也；凡有，皆象也；凡象，皆气也。气之性本虚而神，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，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。”

“至诚，天性也；不息，天命也。人能至诚，则性尽而神可穷矣；不息，则命行而化可知矣。学未至知化，非真得也。舍气有象否？非象有意否？”

“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，性也。不能为一，非尽性也。饮食男女，皆性也，是乌可灭？然则有无皆性也。是岂无对？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，果畅真理乎？”

“张载集本”此条也被分为三条：

“凡可状，皆有也；凡有，皆象也；凡象，皆气也。气之性本虚而神，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，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。舍气有象否？非

① 林乐昌先生有专文依照“鸣道本”《横渠正蒙》对“张载集本”《正蒙》校勘，指出“张载集本”《正蒙》误校有七十多例，他并列出了其中的十例。见林乐昌：《通行本〈正蒙〉校勘辨误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2010年4期，第54—58页。

② 分别见“鸣道本”第161页、《张载集》第50页。

③ 分别见“鸣道本”第177页、《张载集》第58页。

象有意否？”。

“至诚，天性也；不息，天命也。人能至诚，则性尽而神可穷矣；不息，则命行而化可知矣。学未至知化，非真得也。”

“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，性也。不能为一，非尽性也。饮食男女，皆性也，是乌可灭？然则有无皆性也。是岂无对？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，果畅真理乎？”^①

综合比较，只是“张载集本”对于双行夹注的处理才是正确的，“鸣道本”把三条内容放在一段中，最不恰当。

其二，“浮屠明鬼谓有识之”条和“大学当先知天德”条，“鸣道本”作：“浮屠明鬼，有识之死，受生循环，厌苦求免，可谓知乎？以人生为妄见，可谓知人乎？天人一物，辄生取舍，可谓知天乎？孔孟所谓天，彼所谓道者，指‘游魂为变’为轮回，未之思也”。

“大学当先知天德，知天德则知圣人、知鬼神。今浮屠极论要归，必谓死生转流，非得道不免，谓之悟道可乎？悟则有义、有命，均死生、一天人，推知昼夜、通阴阳，体之不二。自其说炽传中国，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，已为引取，沦胥其间，指为大道。其俗达之天下，致善恶、知愚、男女、臧获，人人著信，使英才间气，生则溺耳目恬习之事，长则师世儒宗尚之言，遂冥然被驱，因谓圣人可不修而至，大道可不学而知，故未识圣人心，已谓不必求其迹；未见君子志，已谓不必事其文。此人伦所以不察，庶物所以不明，治所以忽，德所以乱，异言满耳，上无礼以防其伪，下无学以稽其弊，自古诚淫邪遁之词翕然并兴，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，自非独立不惧，精一自信，有大过人之才，何以正立其间，与之较是非、计得失？”

“四库本”此两条合为一条，作：“浮屠明鬼，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，遂厌苦求免，可谓知鬼乎？以人生为妄，可谓知人乎？天人一物，辄生取舍，可谓知天乎？孔孟所谓天，彼所谓道，惑者指‘游魂为变’为轮回，未之思也。大学当先知天德，知天德则知圣人、知鬼神。今浮屠极论要归，必谓死生转流非得道不免，谓之悟道可乎？悟则有义、有命，均死生、一天人，惟知昼夜、通阴阳，体之不二……何以正立其间，与之较是非、计得失？”

^① 分别见《诸儒鸣道集》第186页、《张载集》第63页。

“张载集本”与“四库本”相同，只不过是由点校者依据《宋文鉴》把“四库本”中的双行夹注改为了正文。这样，“鸣道本”中本有两段双行夹注，在“四库本”中变成了一段，而“张载集本”则把“鸣道本”中双行夹注的内容都变成了正文。中华书局点校者指出，“浮屠明鬼”条文字又称《与吕微仲书》，收入《张载集》第350页，作：“浮屠明鬼，谓有识之死，受生循环，亦出庄生之流。遂厌苦求免，可谓知鬼乎？以人生为妄见，可谓知人乎？天人一物，辄生取舍，可谓知天乎？孔孟所谓天，彼所谓道者，惑者指‘游魂为变’为轮回，未之思也。大学当先知天德，知天德则知圣人、知鬼神。今浮屠极论要归，必谓生死转流非得道不免，谓之悟道可乎？悟则有义、有命，均死生、一天人，惟知昼夜、道（当为通字）阴阳，体之不二……何以正立其间，与之较是非计得失？”^①

比较上述四者可知，“鸣道本”、“四库本”、“张载集本”各有失误也各有所长，当以《与吕微仲书》为准（也可能张载在编撰《正蒙》时，未严格对照《与吕微仲书》，故《正蒙》与《与吕微仲书》未必完全一致）。

第三，“益物必诚”条，“鸣道本”后有双行夹注：“铭诸牖以自诏”，此为今本所无。^②

第四，“戏言出于思”条，“鸣道本”作：“戏言出于思也……引咎其不出汝者，长傲且遂非，不知孰甚焉”。

“张载集本”作：“戏言出于思也……归咎其不出汝者，长傲且遂非，不知孰甚焉”，中华书局点校者指出，在《宋文鉴》中，“归咎”已经误作“因咎”，可知出现的时间应该很早。^③

综合判断，虽然“鸣道本”《横渠正蒙书》是目前所见唯一的宋刻全本《正蒙》，但却不是最好的版本。我们对张载著作的研究也不能完全以此为据。此外，通过对今流行的各《正蒙》版本与“鸣道本”《横渠正蒙》的比较可知，《正蒙》的双行夹注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，而是由作者的“原注”和该书的整理者逐渐添加而成的，且各版本之间在双行夹注内容上也不尽一致。

① 分别见《诸儒鸣道集》第188页、《张载集》第64、350页。

② 分别见《诸儒鸣道集》第191页、《张载集》第66页。

③ 分别见《诸儒鸣道集》第192页、《张载集》第66页。